



金盾研究

江其盾

金庸研究

第二期

海宁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金庸研究

第二期

顾问:陆致远

沈利华

姚水根

编委:姚佐江

倪鑫龙

王敬三

邢祖康

莫子兴

陈伯良

黄嘉平

蒋连根

主编:王敬三

校对:钱金霖

封面题词:冯其庸

封面摄影:方炳华

学会地址:海宁市长埭路 139 号

电话:(0573)7038204

编辑部:海宁市方便路 118 号

电话:(0573)7021843

金庸作品
展示厅:海宁市紫微城内

电话:(0573)7023966

传真:(0573)7023956

邮编:314400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回故乡观光。

海宁市委书记沈雪康、市长钱满程向他介绍家乡情况。(方炳华摄)



1997年4月4日金庸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会见了海宁市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陆致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利华，市金庸学术研究协会会长王敬三并摄影留念。

(郁海纓摄)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偕夫人在嘉兴市、海宁市领导陪同下在盐官观看“一线潮”。



金庸偕夫人在老盐仓观看“回头潮”。



1997年9月1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市领导钱满程陪同查济民、查良镛(金庸)、杨振宁先生在盐官观赏“天下奇观海宁潮”。



(方炳华摄)



(钱雪军摄)



(钱雪军摄)

1996年11月11日，海宁市《金庸研究》首发式暨“金学”研讨会在海宁宾馆召开。

金庸在盐官会见了与会著名学者冯其庸、严家炎等各大学教授(上图)

研讨会在热烈气氛中召开(中图)

会场一角(下图)



97海宁市金庸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3月22日在市府会堂召开，市委书记沈雪康、人大主任顾余善、政协主席陆致远、副市长姚水根、宣传部长沈利华、统战部长骆松康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市委书记沈雪康同志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骆松康(左)、宣传部副部长孟建良(中)和袁花镇委书记、本会研究员周国建(右)出席会议。

骆松康同志讲话。



会长王敏三(左1)顾问倪鑫龙(左2)副会长莫子兴(左3)副会长邢祖康(右1)在开幕式对出席会议的市领导和与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



1997年5月9日
海宁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金庸研究会在米谷画廊举办“'97迎香港回归金庸故乡行图片展”，开幕式由宣传部长沈利华主持，副市长姚水根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上图)，市政协、宣传部、金庸学术研究会负责人剪彩(中图)，宣传部长沈利华与市文联同志畅谈宣传金庸和展览会参观情景。

查良鏞先生捐贈“云松書



1996年11月4日查良鏞先生捐贈“云松書舍”儀式在杭州舉行，省、市領導及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



云松書舍一角“松風明月樓”。

胸中涵情軍底波瀾
造福桑梓垂名玉宇

查良鏞先生捐贈云松書舍

劉一振 丁亥年十一月

休養小園一夜宗情趣
其理融會通冬人解得
功者竟聲心襟實美世

以中松書舍款西子張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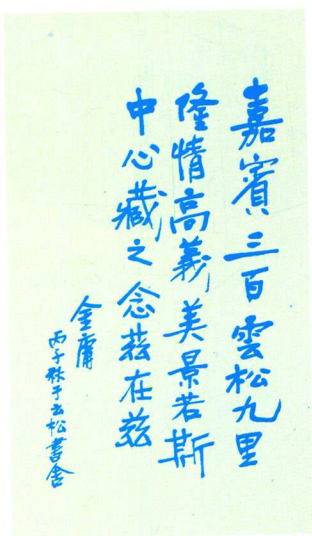


中共浙江省省委副書記劉 楓題詞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題詞



金庸在“云松书舍”捐赠仪式上讲话



金庸感谢嘉宾即兴挥毫题词。

云松书舍庭院一角。



(本页照片王敬三摄)



江南特色正大门

金庸先生为故乡新建的紫薇(文化)城门楼、牌坊书丹,支持家乡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为繁荣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助阵。

紫薇城地址硖石镇繁华的商业街工人路黄金地段。由浙绒公司兴建,为我市深化改革、实施再就业重点项目,占地7.5亩、建筑约8000平方米。建有名人壁、天桥及楼台高阁等仿古建筑,用驰名中名的硖石灯彩装饰,展示海宁的潮文化、名人文化、灯文化特色,融高雅艺术与文化娱乐为一体,活跃群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



北疆风格的东城门



紫薇城一角

(本页照片永良摄)

《金庸研究》第二期

目 录

金庸小说研究

-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严家炎(1)
- 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 陈平原(16)
- 金庸小说风格的嬗变和文学意境 杨兴安(24)
- 奇迹中的奇迹
- 论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识 龙彼德(36)
- 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严伟英(50)
- 金庸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 卢 玲(80)
- 亦侠亦史与非侠非史
- 谈金庸小说中的侠与史 徐志平(97)
- 注重发掘金著的教育与传播价值 闻 声(105)
- 杰作的启迪与浅陋的感悟 王学海(108)
- 南海鳄神论 丁 进(111)

金庸小说随笔

- 谈金庸的《三剑楼随笔》 苏振元(122)
- 喜读金庸早年的随笔 陈伯良(129)
- 金庸与“云松书舍”
- 浏览书舍随感 王敬三(133)
- 读金庸札记(三则) 龙彼德(142)
- 金庸武侠小说随谈
- 在《金庸研究》首发式上发言 刘开农(145)

品茗看剑读金庸	蒋连根(149)
---------------	----------

金庸集萃

历史回眸:邓小平接见金庸	吴跃农(151)
大学的金庸	胶 茶(155)
金庸妙笔海宁潮	王敬三(160)
金庸故里三鞠躬	方炳华(162)
《方寸国土万千情》的镜头瞄向金庸故乡—海宁	倪鑫龙(164)

金庸纵横谈

查大侠纵情话香港	秦立德 谭庭浩(166)
书剑江山	
——金庸的阅读世界	叶姿麟(171)
长风万里撼江湖	
——与金庸一席谈	杜南发(177)
金庸访问记	林以亮 王敬羲 陆 离(190)
文人论武	
——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刘晓梅(202)

学术研究动态

在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成立典礼上的发言	
.....	卢敦基(208)
走进学术视野中的金庸	
——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建新 李杭春(211)

附 录

北国初春有所思	查良镛(237)
迎香港回归金庸小说人物风情国画展部分作品	本会(255)
本会大事记	莫子兴 钱金霖(259)
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分工名单	(265)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严家炎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鲁迅、茅盾、郑振铎、瞿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有时也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草菅人命,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五口。《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

人”。好像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付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1]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2]，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3]到《笑傲江湖》，金庸更带有贬意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4]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颀所杀。

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颍以病亡，朗乃刺杀颍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

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以称纪？^[5]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奸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有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

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蕃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辨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问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偈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等。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也太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